



# 乡土烽火:沙汀笔下的“抗战大后方”

□叶 丽

自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沙汀深受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影响,决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其“应有的助力和贡献”。他笃信“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力求穿透复杂的社会现象、深描真实的生活画卷,形成了沉郁冷峻却不乏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社会陷入巨大灾难,也改变了中国民众包括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战争爆发后,沙汀赶赴延安,去往晋察冀边区,后又返回家乡四川涪水,纵观沙汀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来自返乡之后蛰居安县的“涪水十年”,著名的“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历经辗转流徙,经受了战争洗礼的沙汀最终扎根川西北乡土,这片土地也孕育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风骨,其创作成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鲜明标杆,在大后方抗战文学的星空中烙下了属于沙汀的印记。

## 在熟悉的乡土中沉淀创作

诗人卞之琳曾感慨,抗战的“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

了人群的组合”,无数民众以及作家、文人随战争迁徙、流亡,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的剧变与重构。上海沦陷前夕,沙汀回到家乡四川,随后前往延安、华北参与抗战,最后又回到四川大后方。在这场看似“可差的退却”中,沙汀对生活的认识逐渐深化,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也在不断调适。正是在这种“向熟悉经验领域不断回落的趋势”中,他的创作臻于成熟。

“八·一三”事变后,身处上海的沙汀深受触动,萌生了写作报告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来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一边参加伤兵募捐等各种慰问活动,一边尝试以通讯报道的方式呈现“救亡运动的教育意义”。但随着战事的吃紧,其生活日渐窘迫。上海沦陷前夕,沙汀回到成都,进入中学讲授国文课。但他并不“安心”,“想动一动,搞创作”,尤其是看了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之后,“情绪更加不平静了。最后,决定到华北敌后去,写些报导来激励人心”。

1938年8月,抱着助益抗战的愿望,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同行从成都乘汽车走川陕公路前往延安。他们先抵四川北碚县城梓潼,又过剑阁,而后滞留宁羌,一路兜兜转转,途经半月,终于抵达延安。抵达延安后,沙汀被留在鲁艺教书。适逢在晋西北前线作战的贺龙将军来延安作动员演讲,演讲深深鼓舞了沙汀,激发了他为贺龙写作传记的热情。同年11月,沙汀跟随贺龙军队前往晋西北、冀中等地搜集写作材料。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并非易事,随军作家如何调整自身位置去动态地贴近抗战、融入陌生的生活是沙汀遭遇的难题。他体味着隐微的苦闷:“虽然我看见了—些敌后的新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并且得到了一般的概念,然而他们原来怎样?其间经历过如何的过程?这一切我都不很清楚,因而,我总觉得我对他们是相当陌生的,不能更深层地了解他们。”敌后的“新的情况”和“一般的概念”在流动的时空中难以沉淀、转化,此行之后,沙汀表示自己“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的更深一点,更久一点”,秉持着“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的创作理念,1939年底,沙汀动身返川,努力在熟悉的乡土中寻求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 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风格

抗战初期的流动经历让沙汀对前线、后方两种不同的战时生活有了深刻体验。返乡后,沙汀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走向自觉与成熟,其写作姿态也从动摇走向坚定:“我们应当从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民族需要入手,而不该固执一种一定的尺度”,抗战、社会进步的目标和趋向虽然一致,“但工作却是多方面的”。随着战事的推进,作家们普遍意识到战时中国现实的差异性,应该“各自选定一个最适当的哨位,最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使人尽所长,共同朝着一个终极的目标,努力迈进”,应当“从光明和黑暗的交织中去正确的理解光明,理解黑暗”,从而更本质地把握和表现抗战。

沙汀擅长以现实主义手法批判大后方基层社会中的痼疾。当他返乡直面国统区的腐朽时不由感慨:“我们的社会发

## 抗日战争时期,沙汀赶赴延安,去往晋

察冀边区,后又返乡蛰居“涪水十年”。他的

整个创作生涯将笔触深扎熟悉的川西北,

始终秉持“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现实

主义信条,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斗

争中去”。沙汀的创作深刻揭示了战时大

后方基层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与权力纠葛,

是抗战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重要

代表,对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新时代的文

学都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展是太不平衡了。”在他看来,对大后方的“暗影加以暴露,加以讽刺,还是在要求改革,并不是消极的,仍旧一样地是积极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是沙汀批判不合理兵役制的精巧之作,作家吴组缃称赞它为抗战文艺中“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全中国新文艺史上,可以相与比伦的作者亦不多见”。《在其香居茶馆里》展露了沙汀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关系、在“狭小”中聚焦矛盾核心的能力。故事开篇,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联保主任方治国便一纸密信将镇上实力派邢么吵吵缓役了四次的二儿子抓了壮丁,由此双方在 its 香居茶馆中发生激烈争吵,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双方的“吃讲茶”演变成了一场拳脚相加的暴力事件,故事在“很好说话”的新县长给了邢大老爷面子而释放那位“壮丁儿子”的戏剧性场景中落下帷幕。

小说意在以方、邢二人的关系呈现乡土地方的权力关系网。活在对话中的“新县长”是冲突双方社会关系的交汇点,“新县长一上任便宣称他要扫除兵役上的种种积弊”,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不休、继而大打出手的共时语境。小说结尾,贯穿全文的“兵役改革”的神秘面纱被新县长“其实很好说话”一语揭开。在新县长的说话艺术中,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被一张更大的“网”包裹,如沙汀自述:“邢么吵吵、联保主任、陈新老爷之流,还是平常早已熟悉的人物。也只有平常积累得多,当其发现最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时,才能起到‘点火’的作用,把许多零散的东西联成一个整体。”

《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兵役问题为火引,展现出战时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作为国统区基层政权的象征,“新县长”借整顿“役政”施展权力,由此引发基层当权者与地方实力派的连锁反应。当沙汀将双方的矛盾置于权力结构下审视时,他精准捕捉并刻画了基层社会中的一类人”,揭示了战时国统区基层社会的结构性变动。

## 点燃“焚毁旧生活的火焰”

大后方的众生百态如“深藏着的可贵的矿苗”,在沙汀的文学创作中生根发芽。他的小说力图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揭示其背后丰富的时代意义,推动战时国家、民族的进步与改革,如《联保主任的消遣》中的“救国公债”、《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兵役整顿”以及《淘金记》中的“淘金热”等。暴露黑暗的目的在于重建,沙汀深信“中国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确乎需要更新,而文艺又足为一助,我相信讽刺暴露,是不会就在怨讟下短命的。”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

沙汀的讽刺小说寄寓着他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向往。在沙汀眼中,抗战是个人/人民通向民族/国家的“改造运动”,暴露讽刺的文学是抗战建国的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



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沙汀心怀对革命、对民族、对国家光明前景的信念,通过鞭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淘金记》就是深刻批判国民党治理下基层社会混乱的作品。当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他惊异地发现地方上正在兴起淘金热,“就连一两个有着正当职业的青年”都跑进山沟里淘金去了,有的乡绅参与淘金大潮,也“大挖特挖起来”。那些打着“赈济灾民”口号的野心家,把淘金的借口换成了“开发资源”和“抗战建国”。针对这些发国难财的坏恶分子,沙汀的《淘金记》集中地、犀利地揭示其暗面,旨在点燃“焚毁旧生活的火焰”。这延续了他推崇鲁迅、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鞭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卞之琳读完《淘金记》后赞叹:“沙汀居然制出了这样一面照妖镜来,象X光似的照出了我们皮肉底下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底下的人性,居然从这样的腐朽里变出或提炼出了神奇,不是炫奇的把戏,而是有意义的艺术品,倒反而使我更爱了我们这个民族,也更不致对它绝望了。”

战时返乡后,沙汀沉潜于后方乡土,努力向生活的深处发掘,攫取“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在战时所激起的浪花”,从而展现了抗战文艺的另一种面相。沙汀的川西北书写内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世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风格沉郁而质朴,犹如“一杯浓醇的茶”,初觉苦涩却让人回味无穷。沙汀虽着力于描画“狭小”的川西北乡镇,但他“反映的现实生活还是当代革命风暴席卷的对象,并不在‘时代冲击圈’外”。

沙汀有着非常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创作上始终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坚持“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斗争中去”,但也因特别推崇“狭小”而深入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受到了一些关于“客观主义”的负面评价。沙汀自己也对此前的创作理念作了省思,1944年底,他在《向生活学习》中具体谈到:“过去三年,我是在农村里度过的。我在初的希望总以为自己可能更加接近我想知道的农村社会……首先,在这三年里面,我的生活范围自然是很狭小,但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当中,我又何尝认真地生活过?何尝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了在我周围的人物事件?其次,我所能接触的并不局限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却全然以他们为对象;而这就恰恰证明了我的疏忽的可怕!”在《淘金记》之后,沙汀在1946年完成了《还乡记》,这是他消化批评、主动调整后的结果。这一转变体现出沙汀对“进入生活”“向生活学习”方面的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沙汀也遵循新的现实主义原则,积极深入生活、调研走访,主动回应“时代大潮流冲击圈”。

沙汀的文学书写既深入乡土民间,又贴近现实,与时代同频共振,对新时代文学也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当下,广大作家更需要像沙汀那样,认真对待生活中的人物事,不断擦亮创作的初心,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图景中,捕捉乡村变化中的细节和本质,让文学的笔扎根土地,持续向生活的深处挖掘,创作有温度、接地气、血肉丰满的好作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评 论

继《日子疯长》《满世界》《典范》之后,龚曙光近日推出新散文集《寓言之岁》,其中有关于故乡物事的追忆,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有对身边各色人等的描摹,有关于AI时代的哲学探索,也有面对某些特殊时刻的心态纪实。所有篇什或记事,或写人,或谈物,或写底层生计,林林总总,其实都关联着当下社会三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人与自然的离合、他乡与故乡的纠缠,现实与未来的联结。龚曙光个人经历丰富,精神生活敏锐,像一个“倔强霸蛮的少年”,决意在历史记录的坚硬石墙上,狠劲地“抓出几道指痕”。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话题。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走向现代化进程。诗人们感叹人们对自然不再感兴趣,正在忘记自然生命的美好和重要。由于工作关系,《寓言之岁》的作者曾经访问过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多伦多的电视塔等,作者认为这些建筑,都在某个历史节点上代表了人类某项新的技术或某种信念,值得自豪和尊敬。但他认为,让人痛心的是,在许多山水景观之间,增添了许多人造景观和仿古建筑,“景点越来越多,而自然遗存的景观却越来越少”。作者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反思这种“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少”的悖谬,更在于把这种痛感提升到人类审美力的高度。在《山里》,作者向雄心勃勃的人类发出人警醒的诤问:“在这一多—少的趋势下,人类是否应当更决绝地捍卫自然景观的原初性和自然审美的纯洁性?”确实,正如作者所言,尊崇自然,敬畏造化,是我们与世间万物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人类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脱去自己的自然根性。

乡土书写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个主题之所以绵延不衰,是因为在很多优秀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他乡与故乡的纠葛。两者的相互纠缠,构成了百年来乡土书写的种种格调与样貌。但正如散文家梁遇春在谈流浪汉精神时说过,漂泊精神不必一定在流浪者身上体现,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同样,他乡与故乡的纠缠也不必一定是天涯游子才会深切地感受到,有时在乡土中生存的人,这种纠缠也一样激烈。研究生毕业后,龚曙光就一直在湖南生活与工作,但他是个满世界跑的人,他曾写过《满世界》一书,钟叔河先生为其作序时认为他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在观察现代世界。这种“满世界的观察”,构成的就是一种精神的他乡。观察世界的范围越宽广,思考的程度越深刻,现代性的视野越是开阔,这种精神感受的力量就越强。作者曾经沉浸于历史场景与文化场域中,“去体会湖湘代表人物的命运、心态和情感,力图从其迥异的人生轨迹、特立的人格个性中,找到一种共同的精神密码”。如《猫和尼姑》写吴俟庵的信仰生活,出之内囿,落于凡尘,但坚定而执着;如《一个人的桃源》写老汤满腔的拯救意识,要拯救湘西西北民屋,要再现桃花源,要复活东方村落文明;如《一个人和一座村寨的悲欢纠缠》写黄于纲在“一场没有目的的人生逃亡”中,怎样重新捏拢自己破碎的生命。正是在这些平凡而闪亮的生命中,作者发现了湘人“不是为生活而活,而是为生命而活”的精神密码,用诗的言说方式将湖湘的文化性格命名为“骨血浪漫,生命如花”。作者的“精神他乡”源于现代性视野下的全球观察,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漂泊。精神故乡与他乡的纠缠越是持久,一个人的生命创造力就越强盛和丰满。作者在湘人湘事的书写中,“听自己的心跳,听彼此的心跳”,这是作者在满世界走过之后,重新感受自我精神故乡的力量。

现实与未来的联结,是现代寓言所承担的叙事功能。在传统观念中,寓言作为一种体裁,通常被视为叙事文学的专利,所以人们往往用民族寓言、历史寓言来定义一个宏大叙事的意义所在。《寓言之岁》是散文,作者一再表示在“我们”和“我”两种视角中,他选择的是“我”,写的是个体心灵的自白。作者用《寓言之岁》来为这本散文集命名,用意在于以个人生命的此在感悟为中介,联结起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意义。本雅明曾说过,寓言才是现代经验的真实表达,这不仅因为现代寓言是碎片的、非有机的,不依赖符号的完整性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寓言的意义具有延迟性,不直接呈现真理,而是通过解谜来揭示真相。《寓言之岁》中不断写到时序的常与非常,用猜谜的方式回应自然的种种隐喻,本质上是在开掘自然向人类遮蔽的信息,在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也是人在现实与未来的联结中寻找与世界和谐共生的可能。

寓言之岁已经来临,人在精神他乡与精神故乡的纠缠中能否找到自己的定位?人是否有意愿、有能力通过寓言倾听自然传达的信息?人在现在与未来的联结中能否重塑自信?在《霍金十问试答》中,作者虽然认为人的能力有限,但还是相信人类能够预测未来;虽然认为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但还是愿意相信人类的理性和伦理能够驾驭科学与技术这头猛兽。作者以这样的一本散文集,谈乡土,谈自然,谈湘人的文化密码,谈自我的内心纠结,在思考上与时代切近,以“我”的渺小和具体回应“我们”的宏大,本质上是一种反抗悲观、拒斥绝望的尝试。《寓言之岁》中每一道“指痕”,都可视之为作者为寻觅回乡之路所付出的努力。

(作者系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故乡与他乡的寓言交响

——读龚曙光散文集《寓言之岁》

□谭桂林



《寓言之岁》,龚曙光著,深圳出版社,2025年4月

# 是星辰,也是诗

□北 乔

面对天空下的水潭,也是在潜入心潭深处。正因如此,我才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站在一处水潭边,世界和灵魂都会荡漾,那些体验之后的呼吸,那些自然与生命的对话,那些潜伏于灵魂深处的黑与白,在某个瞬间涌动为精神之潭。一切是抽象、游离的,一切又是全真的具象。”我的第二部诗集《大故乡》和第三部诗集《大地上的星辰》,是聚焦自己的足迹,以所到之处为引,激活某些沉睡的思想与情感。与《临潭的潭》相比,《大故乡》和《大地上的星辰》所涉及的地方更多些,但内

在是同样的纯粹。我在后记中说:“我想说的是,我的诗是传统意义的山水诗,但似乎又不尽然。在情感上,我从没有把所写的地方当作风景当作远方。此心安处即故乡,或者我总是怀着故乡般的情意在写某个抵达的地方。”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在我看来,所谓的还乡,其实是返回真诚的真挚的纯然的性灵之地。我笔下的每一处地方,我都怀有与故乡一样的情意,都与我的出生之地建立了某种联系。否则,我不会下笔的,也无从下笔。”在我的理解中,及物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及物也是我们情感、伦理和思想的天然基因。我试图建立“大故乡写作”的理念并不断实践,我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的要义,也是我们敬畏大自然的应有之情。一直以来,我总认为众生万物都是平等的。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员,人想要实现自我和

谐,就得将自己置身于大生态之中。

对于中国哲学,我偏爱的是道家之道。万物皆有灵,人可以从以万物为镜,为另一个“我”。诗写万物,本质上是在从万物中找到自己,看到自己。这似乎不是自然写作、生态写作等命名所能涵盖的。人是自然之中的人,人是大生态中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写作都是自然众多声音中的一种,都是大生态中的细微呼吸。我在写诗或思考诗歌时,总会想到道家哲学,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面对众生万物,定位我们个体的存在,或许就能够写出通达和释然的文字。

我在诗中所描述的情景和情境,很多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事物。当我们从纷繁的生活中走出,回到属于自我的那个时空间,便会觉得似曾相识。只是因为我们过于匆忙,总没有时间停下来,让这些画面从心底深处浮现。因此,我试图营建一个个小小的物象与情境,让大家可以有走进的入口,有一种安静下来与自己交谈的氛围。在我想来,这其实是文学极富魅力之处。我们读他人的故事,读他人的人生,体味他人的情感,走进他人的世界,最终都应是与我自我的面对面。

我想,每个人都是大地上的星辰。

(作者系诗人、作家)



故乡,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其实也有故乡的印记。这些地方对于生命体验的影响,有时并不一定能直接感觉到,但一定会融进我们的血液里。更何况,这些地方很可能是我们人生中转折的路标,是记忆的坐标。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作家应该回到曾经的那个“我”,回到曾经的那些地方,写下那时你所思想、那时地方的具体情形。重回曾经的岁月、捕捉当年的心跳,才发现那些地方真的影响到了我和我的创作。因此,我的写作其实是在为心灵拼图。

诗人与自我的对话是写诗的起点,经此与世界对话是写诗的目标,至少是一种创作理想。我自小在乡村长大,沉浸于自然万物之中,童年和少年时,自然万物就是我最好的伙伴。后来,我从事摄影摄像工作,对画面情有独钟。我的诗歌之路也是从画面开始的。倘若心里没有画面,我就写不成诗。我的第一本诗集是《临潭的潭》,从书名就能看到写作冲动的原点和诗歌的本相。临潭是甘肅的县,我在临潭生活,也在临潭种植我的诗歌。这些风物和诗句,都是在临潭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也是属于我的。同时,“临潭”又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临潭而立,注视眼前的潭水。这水潭里面有无尽的平常与玄妙,这水潭是自然的,也是我的心潭。我写诗的时候,既是在